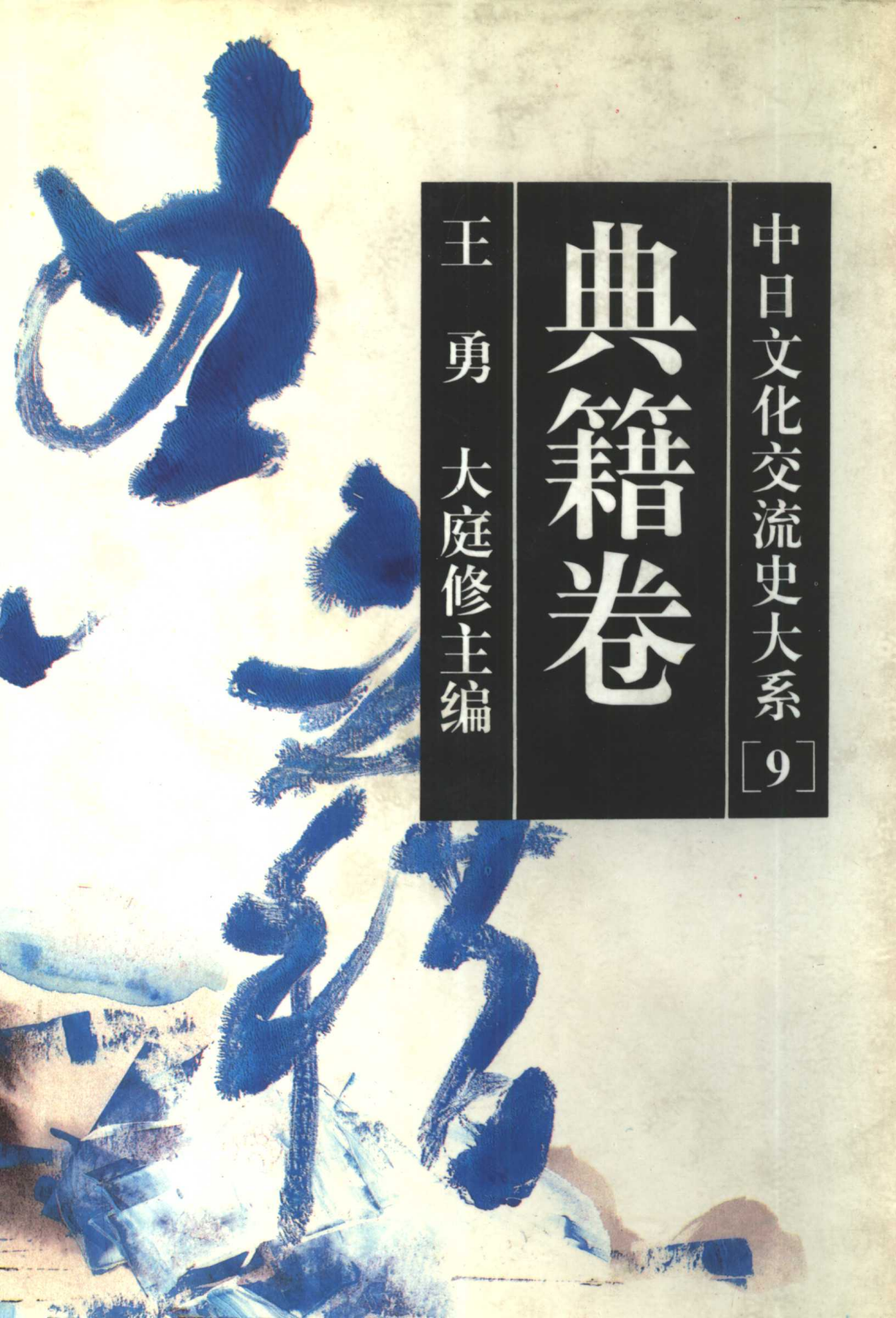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

[9]

典籍卷

王 勇 大庭修主编



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[9]

典籍卷

王 勇 大庭修主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策 划:张宪章
责任编辑:张宪章
封面设计:池长尧
责任校对:韦 伟

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
典籍卷
王 勇 大庭修主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 插页 5 字数 29 万 印数 1-2 000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13-01171-5/G · 292 定 价:26.50 元

本书系由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日本国大修馆书店共同出版
中国版(中文)的专有出版版权归浙江人民出版社所有
日本版(日文)的专有出版版权归大修馆书店所有

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》

编辑委员会

中国方面

主 编 周一良

副主编 严绍澍 王 勇

编 委(以中文姓氏笔划为序)

马兴国 王 勇 王晓秋 李廷举

刘俊文 严绍澍 杨曾文 周一良

日本方面

主 编 中西进

编 委(以中文姓氏笔划为序)

上原昭一 大庭修 中西进 吉田忠

池田温 宫田登 源了圆

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》

典籍卷

主编 王 勇 大庭修

著者(以撰写章次为序)

王 勇 序论:汉籍与汉字文化圈

第三章 日本汉籍西传中国的历程(除第五、八节外)

第四章 佚存书与“华刻本”(除第三节外)

大庭修 第一章 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(石晓军译)

第二章 江戸时代的中日典籍交流(石晓军译)

藤善真澄 第三章(五)宋代日本典籍之西传及其影响(王丽萍译)

第四章(三)佚书的回归与天台宗的复兴(王丽萍译)

蔡 毅 第三章(八)俞樾与中日汉籍交流

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》序

周一良

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日本大修馆书店合作，分别用中文日文出版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》。我谬蒙推为中方主编，虽曾参与擘画，而年来精力就衰，势难始终克尽主编之责。但是，对这套书仍觉有必要谈一点感想。

首先，这套书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学术界合作与文化交流的意图。每卷都是中日两国学者合写，各自从不同侧面阐述本卷主题。用这种密切配合分工合作的方式写文化交流史，恐怕还是本书首创。各个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或互有联系，或各自独立，其间并不要求整齐划一，而是百花齐放，起交流作用。书名交流史，首先在写作方式本身就贯穿了标题的精神。而且，由于两国学者分别执笔，各自掌握充分资料，因而更利于贯彻本书宗旨——阐明文化交流自来是双向的、相互影响的。再从撰写方式来说，本书执笔人有学界耆宿，有史坛新秀，而更多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。用我国说法，叫作老中青三

结合,这是又一意义上的合作。

其次,本书内容涵盖面比较广阔,计分十个方面:历史、法制、思想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、民俗、科技、典籍、人物,不愧大系之称。有些部分,在一般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中属于题中应有之义,如思想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。某些部分通常交流史中较少提到,如法律、科技。至于民俗与典籍这两个部门,自来此类著作中更是绝少涉及。由这十个门类,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时代之久,方面之广,相互影响之深,相互关系之密,世界上几乎任何两国之间都难于比拟。

本书试图用浅近笔调表达学术性内容。各卷包含的专题大都为作者研究所得,但为保持各卷主题的体系,作者大抵采用点面结合办法,在突出重点的同时,对面上亦有必要的相应的叙述。因此,本书既可供专业人员参考,也适于一般读者阅读,此感想之三也。

是为序。

1994年9月15日写于北大燕东园

目 录

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》序·····	周一良(1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序论:汉籍与汉字文化圈·····	(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·····	(2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一)绪言·····	(21)
------------	------

(二)奈良、平安时代汉籍的输入·····	(2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三)入唐、入宋僧携来之典籍·····	(39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四)唐商献纳品与中国典籍·····	(58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五)镰仓、室町时代的僧侣与中国典籍·····	(7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六)日本对古代典籍的保存·····	(84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七)和刻版的问题·····	(87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八)日本搜求汉籍之倾向·····	(94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二章 江户时代的中日典籍交流·····	(9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一)绪言·····	(97)
------------	------

(二)长崎的唐人贸易与书籍的输入·····	(9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三)资料的概观·····	(10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(四)代表性文库中输入之汉籍·····	(138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	(五)其他领域汉籍的输入·····	(162)
	(六)世界形势与输入汉籍·····	(168)
第三章	日本汉籍西传中国的历程·····	(176)
	(一)日本典籍西渐史概观·····	(176)
	(二)遣唐使与日本典籍的输出·····	(188)
	(三)《三经义疏》在中国的流布·····	(208)
	(四)10世纪前后:中日典籍交流的转折点·····	(226)
	(五)宋代日本典籍之西传及其影响·····	(238)
	(六)元明时代日本禅僧著述之西渐·····	(248)
	(七)清代:日本典籍西传的全盛期·····	(270)
	(八)俞樾与中日汉籍交流·····	(289)
第四章	佚存书与“华刻本”·····	(304)
	(一)佚书与佚存书·····	(304)
	(二)域外求书·····	(321)
	(三)佚书的回归与天台宗的复兴·····	(338)
	(四)日本历代舍经考·····	(345)
	(五)东瀛访书·····	(363)
	(六)日本典籍在中国的刊刻——“华刻本”刍议 ·····	(382)
	中文版编后附志·····	(401)

序论：汉籍与汉字文化圈

文字与文化圈

倘若我们打开一幅世界地图，用红笔勾勒出几个相互独立的文明圈，便会惊奇地发现：在诸如基督教文化圈、伊斯兰文化圈、汉字文化圈内，杂居着数支乃至数十支甚至更多的民族，这些民族各自使用独特的语言，而往往共享同一种文字。以共同的文字为标识的文化圈，超越民族、语言、国家而存在，拥有其自身盛衰聚散的历史。

让我们将视线投向亚洲，那里的文字与文化，尤其与宗教的关系，可以为我们了解文化圈的奥秘，提供一个直观的认识。

先看中国的西南部，那里的西藏地区以及邻近的斯里兰卡、缅甸、泰国、老挝、柬埔寨等国，尽管民族不一、语言各异，但因为均从印度直接汲取佛教，所以都使用印度系统的文字，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印度佛教文化圈。

再看中国的西面，则有一个与基督教文化圈接壤的伊斯兰文化圈，散居在那里的阿拉伯人、波斯人、阿富汗人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，因而使用统一的阿拉伯文字。在上述印度佛教文化圈与伊斯兰文化圈的交界之处，一个民族由于信仰不同，被分裂在

两个文化圈内:巴基斯坦无论语言还是种族均与印度同源,但巴基斯坦信奉伊斯兰教,因而使用阿拉伯文字。

接着看中国的西北部,在这块广阔的草原与无垠的沙漠中,生息着数支游牧民族,他们的文化传统乃至生活习俗与汉民族迥异,尽管这些区域归属中国境内,却通行维吾尔文字和蒙古文字。

最后,我们再环视中国的东、南邻国,越南、朝鲜、日本诸国由于长期接受儒学及中国佛教的影响,在近代西方文化长驱直入之前,一直将汉字作为授受文化的主要媒介,从而在东亚形成一个以中国的汉族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圈。

19世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《古代社会》(1877年)一书中,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分成7个阶段,依次为“低级蒙昧社会”、“中级蒙昧社会”、“高级蒙昧社会”、“低级野蛮社会”、“中级野蛮社会”、“高级野蛮社会”及“文明社会”。他列举出各个阶段的特征,认为文明社会“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”。

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的《古代社会》给予高度的评价,基本上肯定了他对人类文明的分期法,并且据此把人类的文明史称作“有文字记载的历史”,把“成文史以前”的历史称作“人类的史前史”。

按照摩尔根的观点,文字的发明和使用,乃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。中国在殷商时代已经拥有相当发达的文字体系,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。大约在秦汉之际,随着中原民族频繁向外迁徙,灿烂的中华文明渐次广被四邻。周边诸国在未及自然萌生出本民族文字的状态下,便先后进入汉字的辐射圈内。可以说,由于汉字的广泛流播,越南、朝鲜、日本等国得以打破文明的渐进秩序,从蒙昧或者野蛮阶段,一跃

进入文明社会。

汉字文化圈的形成

汉字在域外的流播,最早是通过人种的迁徙和移居实现的。朝鲜之“箕子开国说”,日本之“泰伯后裔说”,越南之“神农子孙说”,均折射出中国与周邻诸国在人种方面的渊源关系。

自1924年以来,在朝鲜境内发现大量战国末期的“明刀”货币,证明公元前3至4世纪前后,汉字已经传入朝鲜半岛。“箕子朝鲜”的传说散见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魏略》等中国文献,虽然不能全部目为信史,但至少可以视作殷末周初汉人东徙史实的曲折反映。到了三韩时代,辰韩又称秦韩,自云“秦亡人,避苦役适韩国”^①,辰韩当为秦并六国时避乱东徙的齐、燕移民所建。公元前195年,燕人卫满逐走“箕准王朝”,建“卫氏朝鲜”,都王险城(今平壤),维持了近一个世纪的汉族统治。公元前108年,汉武帝灭卫氏,在朝鲜设乐浪、真番、临屯、玄菟四郡,汉朝政权延续了约400年,汉字遂在半岛广为流播。

汉置四郡至4世纪初次第衰亡后,朝鲜进入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三国鼎立时期。高句丽于372年建太学,5世纪初所立的“广开土王碑”^②,碑文1759字,文笔流利畅达,显示出熟练驾驭汉文的能力;百济铸造的“七支刀”,推为4世纪后期的遗物,现存于日本天理的石上神宫,铭文亦古拙可读;新罗则有6世纪的“蔚州川前里书石”(525年)、“永川菁堤碑”(536年)、“丹阳新罗

① 《魏书·东夷传》。

② 亦称“好太王碑”,今在吉林集安,是了解4世纪后期日朝关系的重要史料。

赤城碑”(6世纪中叶)存世,碑文均用汉字写成。^①

综上所述,4、5世纪之交,朝鲜半岛诸国,大多已经掌握并开始实际使用汉字,也就是说,已经成为汉字文化圈中的一员。率先跻身文明社会的百济,其后又成为汉字继续向东方扩散的中继站。

中国人东渡日本的历史,亦可追溯到秦汉以前。“徐福东渡”说虽然含有虚构的成分,但公元前后中日之间已有人物往来当无疑问。据《晋书》载,倭人“自谓泰伯之后”,此说最早见于《魏略》,可证日本与吴越地区关系密切。但是日本正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,是中经百济开始的。5世纪中叶,百济人阿直岐、王仁先后渡日,携去《论语》、《千字文》(当是周兴嗣之前的别本)等,为日本皇太子启蒙。《宋书》所载倭王武的《上表文》(478年),是一篇文辞华丽的骈文,学者或疑经沈约润色;但1968年出土的埼玉县稻荷山古坟铁剑(推定为471年),和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熊本县船山古坟太刀(推定为406—409年),均有100字左右的汉字铭文,可证5、6世纪之际,日本也已经开始实际使用汉字。

至于越南,公元前214年,秦始皇在越南置象郡,随着汉人官员的赴任,汉字也必然在一定范围内传播。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云:“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,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。”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中越人种交融。据《大越史记全书》记载,秦并六国后,交趾人李翁仲入仕秦朝,官至司隶校尉。秦亡后,汉人赵佗在越南自立为王,《汉书》称他治理“甚有文理”。汉灵帝时,任命交

^① 此节内容参照了高明士著《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》,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,1984年。

趾人李进为交州刺史；汉末天下大乱，中原的名士大儒纷纷南下避难，襄助交趾太守士燮振兴文教，故《大越史记全书》称：“我国通诗书，习礼乐，为文献之邦，自士王始。”自秦始皇置象郡，经唐朝设安南都护府，至公元 938 年安南人吴权推翻南汉统治的千余年间，越南基本处于中国统治之下，其制度、文化一仿中国，不能不算是汉字文化圈中的一员。

如上所述，大略自秦汉之际，中华文明渐次广被四邻，从而在东亚构筑起一个在时间上绵延千余年，在空间上跨越朝鲜、日本、越南诸国的文化圈。在这个涵盖数十个民族的文化圈内，汉字不仅是各国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，同时也是超越各种语言的唯一共识符号。

汉字文化圈的萎缩

任何一个民族都执着于自己的语言，甚至将它与祖国的命运维系在一起。阿尔封斯·都德的短篇小说《最后一课》，之所以被译成多种文字，能震撼各国读者的心灵，就是因为作者真切地描述了法国阿尔萨斯一个小学的师生，被迫与母语诀别时的无以言状的悲痛心情。强迫一个民族使用另一种语言，唯有依靠征服或殖民的手段，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不乏例证。

与此相反，人们却可以比较轻易地废弃一种文字，或者主动采纳一种文字。当东亚的许多民族尚处在蛮荒未化的阶段，他们通过学习并使用汉字，如饥似渴地汲取中华文明；当西方文化以强大的优势涌向东方时，这些民族又纷纷倡导使用罗马字，以便追随西方诸国跻身近代社会；甚至连位居汉字文化圈宗主的中国，也曾一度出现废弃汉字的主张。在此意义上说，废弃和采用某种文字，不仅是语言文字上的重大变革，同时也体现一个民族

对文明的抉择和取向,后者的意义或许更为深巨。

我们从汉字文化圈的聚散伸缩的变化中,可以窥探出东亚各国文明的形成、发展、成熟以及嬗变的轨迹。朝鲜、越南、日本通过模习汉字,渐次构筑起各自的文明;但是在此过程中,语言与文字、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,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,他们开始自创文字。周边民族(包括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)一般先在原有汉字的基础上,创造出“拟汉字”,这种“拟汉字”目前已知的大约有 10 余种,如日本的国字、越南的喃字、西夏文字、契丹文字、女真文字、水文字等等。周有光曾对此作过形象的比喻:

“如果画成一幅树形图,汉语汉字是树干,壮字和喃字是南方分枝,朝鲜文和日文是东方分枝,契丹字、女真字和西夏字是北方分枝,还有,云、贵、川、湘、桂诸省的汉字式民族文字是西南的散枝。”^①

这些琳琅满目的汉字的亲缘文字,有的将汉字的字根重新组合,有的按汉字造字规律另行创造,一方面说明汉字文化流播到周边区域已经开花结果,另一方面反映出其他民族的文化渐趋成熟。

进入 16 世纪以后,由于近代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东亚各民族意识的高涨,古老的汉字文化圈出现解体的趋势,这主要体现在汉字的辐射面日趋萎缩:朝鲜使用谚文,日本限制汉字,越南采纳罗马字……汉文典籍在区域间的流通,也因之出现阻滞。

^① 周有光:《汉字文化圈的文字演变》,《民族语文》,1989 年第 1 期。

在近代及近代前这场规模空前、历时长久的文化圈的分化组合中，中国未能表现出积极进取、自我更新的精神，而是采取了闭门退避、与世隔绝的消极态度。由此造成的后果是：我们在遏止外来文明侵入的同时，也放弃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有机延伸。

中国的汉籍研究，便长期笼罩在这种封闭的氛围中。具体地说，学者的眼光大多局囿于国界，鲜有人将视线投向海外；汉籍被狭隘地理解为中国典籍，域外的大量汉籍遗产殆无人问津。

汉籍的定义

所谓汉籍，狭义上释作中国典籍，广义上可理解为汉文典籍。若取广义释之，那么汉籍的外延应当涵盖朝鲜、日本、越南诸国的汉文载籍，甚至包括近代来华西人的汉文著述。

域外人士用汉文著书，大概以高句丽为最早。朝鲜《三国史记》卷二十高句丽本纪婴阳王三十一年（600年）正月条云：

“诏大学博士李文真约古文，为《新集》五卷。国初始用文字时，有人记事一百卷，名曰《留记》，至是删修。”

此处所言“国初”，高明士推定为“高句丽完成国家体制及集权中央”的六代太祖时代（53—145年）。^①这就是说1、2世纪之际，已经有人用汉文撰著100卷史书《留记》，600年时令博士官删减成《新集》5卷。《三国史记》卷二十四百济本纪近肖古王三十年（375年）条又云：

① 高明士：《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》，第23页。